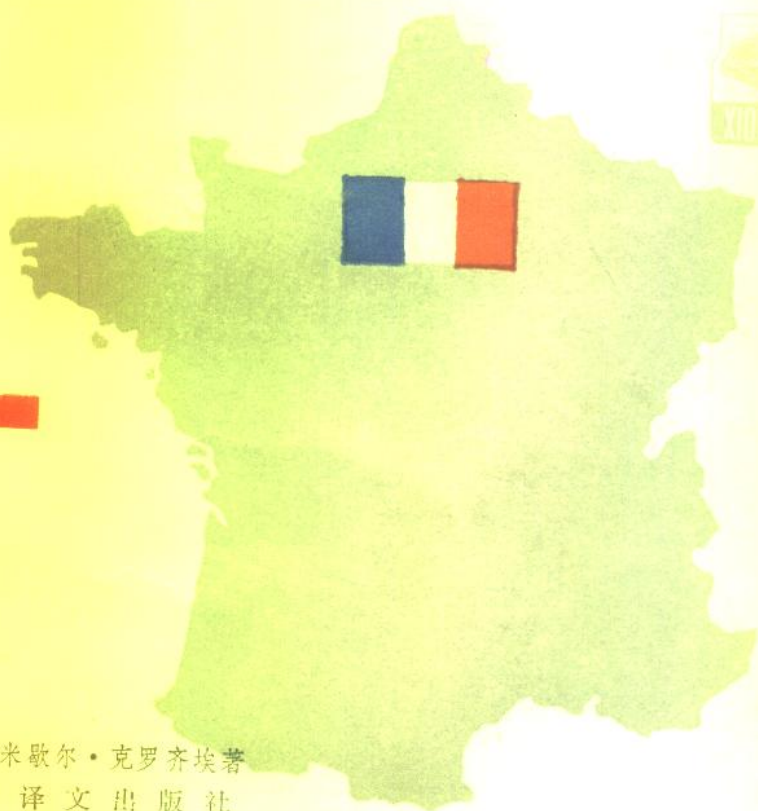


ON NE CHANGE PAS

论法国 变革之路

la société
par décret

法令改变不了社会



法 米歇尔·克罗齐埃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论 法 国 变 革 之 路

法令改变不了社会

〔法〕米歇尔·克罗齐埃著

程小林 沈雁南 译
王大东 杨祖功
穆大英 校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MICHEL CROZIER

On ne change pas la société par décret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982

根据格拉塞和法斯凯尔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论法国变革之路

——法令改变不了社会

〔法〕米歇尔·克罗齐埃 著

程小林 沈雁南 译

王大东 杨祖功

穆大英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1 字数 159,000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600 册

书号：3188·67 定价：1.45 元

50546/38

关于《西欧译丛》的说明

战后以来,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学术界和外交人士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新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同有关研究和出版单位合作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并编成一套《西欧译丛》。这套《译丛》包括整个西欧及其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些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些是带有偏见的,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都赞成,但是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而且资料是比较新鲜和充实的,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欧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丛》读者对象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以及关心国际问题的、尤其是西欧问题的其他人士。

这套《译丛》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便是这套《译丛》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编译室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米歇尔·克罗齐埃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国楠泰尔大学执教多年，现为法国组织管理社会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高级教研室的负责人。他主持过多次有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其它机构的实际功能的社会学调查，围绕权力现象和组织现象开展过多方面的研究。他著述颇多，其中主要的著作，如《官僚主义现象》（1964年），《封闭的社会》（1970年），先后被许多国家翻译出版。1982年春，他应邀访华，在北京、上海等地作过有关西方社会发展的学术报告。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当代法国社会管理体系的种种弊病，对法国社会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作者认为，随着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多，权力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宗教和道德对社会的抑制作用也越来越小。西方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这一切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面临爆炸性的局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社会管理体系日趋复杂化，使已经过时了的社会管理体制日益显得无能为力，法国在西方国家中情况尤为突出。

作者认为，法国社会管理体系的危机在于行政机构的集权化和层叠化。在法国，一切权力集中于高级文官团，这是由社会的精英所组成的社会集团，他们长期以来维持着建立在脱离实

际、保守秘密和限制传播基础上的管理模式,严重地限制了许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遍及社会各个等级、各个行业中的权力集团又造成了机构的层叠化。每个权力集团都严格地限制外人进入,以维护它在社会中的地位。

作者认为,法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机能不良”的问题,他在分析了法国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教育与实际脱节、科研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之后,认为靠法令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法在于挖掘人类资源,鼓励个人的积极性,把潜在的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

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法国社会的措施。例如他提出了地区改革问题,实行分权化;改革国民教育,改组高等学府,使之更加开放;取消高级文官团,改变吸收精英参加管理国家的办法;改变法国研究体制的那种与世隔绝、官僚统治的状况;探索改革发展新兴服务行业的道路。作者在本书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充满变革的世界上,现代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

1979年本书首次出版以后,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著文评介,虽然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克罗齐埃以“社会医生”的名义,对现代社会的管理危机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出的一些论见应该受到从事有关研究国际政治的读者的注意。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克罗齐埃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对法国社会所作的分析以及他所提出的改革方针的全部出发点,都在于维护法国的现有制度,与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改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翻译出版本书,对于作者针对西方社会特别是法国社会的弊病提出并探讨改革的途径,对我国读者了

解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原名《法令改变不了社会》，现作为副题，《论法国变革之路》这个书名系译者所加。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程小林(引言、第一、二、三、四章)、沈雁南(第六、七、十章)、王大东(第八、九章、代结论)、杨祖功(第五章)。全书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穆大英同志校订。

个别地方译文有所删节。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4. 6. 1.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西方社会的危机.....	13
第二章 “法国的弊病”.....	31
第三章 关于变革战略.....	45
第四章 官僚主义现象.....	62
第五章 发挥外省的作用.....	82
第六章 精英集团要开放.....	105
第七章 发挥知识的作用，反对技术统治论.....	126
第八章 空想和幻想.....	147
第九章 发挥企业的作用，反对食利思想.....	169
第十章 开展服务行业的革命.....	189
代结论	209

引 言

自1979年4月本书出版以来,法国的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党的胜利,象一场巨大的滑坡使掩藏在大地之下的万物结构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向不曾预见到这一胜利的人们展示出还存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国。这个法国看上去与先前的法国相同,但实际上,原来深刻的人际关系已经颠倒了。由此产生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辩论改变了原来的方向。结构和问题,甚至与我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辩论,尽管仍然存在,但也只能徒有其表了,格局颠倒了,位置颠倒了,措词本身也不再表达同样的事实。

本书写于1978年,是在论战的动荡气氛中完成的。这种气氛是“新旧制度”之间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真正的一次交锋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不带有时代特点,这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如果不是过时了,也是很遥远的了。那么为什么要再版这本书呢?难道新的时代就不会引起其他论战和思考吗?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见证,1978年难道距今不是太近了吗?

幸而书籍并不一定要象时间环境决定论所主张的那样反映各种事件。作为作者研究各种事件的结果,书籍同样是作者对这些事件作出的一种反应和一种超脱的尝试。如果说本书对这一动荡的一年中所出现的争论和激烈争吵理所当然会有所反映的话,那么,它完全不是一部应时之作。它表明,我情不自禁地起来反对在竞选演说中谈到社会问题时的文不对题和逻辑荒唐。

它首先是我所做的下列努力的结果,我力图用另一种方法推理,并证明有可能找到一个更符合我们时代实际的新逻辑。

“变革”的赞美歌声已经响彻四方。从此,这歌声每天都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我把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用来思考行政部门、企业和各种其他机构中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具体状况。每次,我都力图理解“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我不能轻率地接受那种既有可信地方又有不负责任之处的“变革”说法,当时的执政者和渴望取而代之的人,都在尖锐的政治辩论中经常大谈特谈这种“变革”。鉴于人们对我看作是事实的东西完全不理解,并且进而有可能引起不安,我认为必须探究造成人们强烈渴望“变革”的基础本身,必须探究某些往往很有才干的男女公民(尽管他们是反对派或正是由于他们是反对派)为什么在谋求解决他们的同胞实际遇到的问题时会迷失方向。

我达到目的了吗?当然,这不该由我来作出回答。但是,我觉得提出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1981年平淡的总统竞选运动对此也没有作出回答。至于社会党政府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它们只是表明我国新领导人的坚强的意愿和讲话的一贯性。令人遗憾的是,它始终没有脱离过于精彩的、老一套的演说逻辑。为了弄清改革的实际含义、成功的可能性和要冒的风险,我认为应该首先更加深入地、用与目前带有偏见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如果变革的行动确实是政治领导的中心工作,并且成为政治领导存在的原因和理由的话,这一行动就绝不只具有人们赋予的单义性的含义。变革不会因为变革就成为一个具有效力的整体。赞成变革并不意味着赞成好事,反对变革也不意味着就是反动。变革行动的好坏和是否恰当,既不可用一项理想化的但不可能实现的好事来衡量,也不可用一项计划的逻辑性或严

谨性来衡量，何况这项计划只不过是浮夸的华丽辞藻。有人试图寻找中庸之道，对于他们说来，有点变革很好，但是不宜过多，多了就危险。这 and 好走极端的做法一样不够恰当，鼓吹中庸之道的人希望求得一种折衷。

人们不是为了在地球上实现天堂才进行变革，而是为了继续生存，因为一切不变革的事物都要自行衰亡，因为要想继续保持活力，任何社会和任何机构都需要更新、进步和改造。人类体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发挥作用。象天堂一样美好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死亡，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永无止境的自身建设的停止，而丧失了这种建设，我们便不能作为社会整体而生存。

在撰写本书时，我并不想否定或排除政治家的重要性。政治家们一味重视有关前景和目标的演说，把自己的着眼点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要超脱这种表面现象，必须解决整个政治格局问题。因此，我不主张把自己凌驾于激烈的辩论之上。我虽然对体系和辩论持批评态度，但并不主张对对立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在右派还当权时，我对他们讲要认真考虑法国社会需要变革的问题，只有变革，法国社会才能改变现状，才能适应新的情况，才能保持革新的势头，事后，我又认为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有些使人失望的告诫。对于左派，我曾写文章提醒他们，切勿把变革当成本身就是好事而抱有幻想，也切勿对依靠法令进行的这种变革产生幻想，因为它会使社会机体受到损害，趋于贫乏。

现在，右派已被击败，不再负有任何决策责任；左派取得了胜利，拒绝听取那些不愿迎合其理想主义的、近乎神圣的变革念头的人们的意见；那么，这两种告诫是否仍然有效呢？既然大局已定，民众选举的结果已经揭晓，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将使两派各自都发挥有限的作用，并且长期摆脱不了这种束缚，那么是否

仍需向双方说些什么呢？我不仅认为应该说，而且，我竟认为今后，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辩论更为紧迫的了。

首先对以前的多数派来说，他们有很多东西需要认识，但这需要时间。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另一些人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有必要去认识。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新的变革激情会使某些人忘记，更替是维持民主平衡的关键，应向这些人重申，保守主义表达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的趋向和需要。右派念念不忘要重新执政，只要它懂得了一个社会为了保持活力和富于创造性就需要进行变革，那么，它的贡献将更加富有成效。

戴高乐将军懂得这一点，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组成的多数派，在当时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清了法国社会欠下的沉重的殖民债务。另一方面，这个多数派在复兴国家的同时，也使法国人恢复了对政府行动应有的信赖。它致力于把法国社会引上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二十年的发展使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变革是以官僚主义的滋生为昂贵代价换取的，然而，如不经过卓绝的努力，任何可实现的进步在今天都是难以获得的。

但是，如果说右派在宪法和经济领域完成了它的一部分使命，那它却完全错失了唯一能使其继续执政的第二次历史时机，即改革决策体系和管理方式，改革社会集团、各类能人和职业等级集团这三方之间关系的结构。这些关系，随着时间发展变得不公正了，压抑人而没有效能了。为什么右派未能做到这些呢？原因不在于那样做有可能损害它的利益，也不是因为它目光太短浅，而是由于它错误的推理，由于它无力在质的方面下功夫。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戴高乐将军敲响了特别警钟，此后，他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对

此作出回答，然而为时已晚。乔治·蓬皮杜决意堵死戴高乐开辟的道路。他没有给自己的政策赋予积极内容，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反对派的分裂上。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政府的行动，他只想发展现代化所引起的量的方面的变革。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使用了一套新的变革语汇，只是摆出进行另外一种变革的架式，而实际上却保持了和前任相同的政策。

现在的右派应该懂得，左派可能犯错误，但这绝不能证明右派过去采取拖延政策是对的，绝不能证明它们进行的不是恰到好处错误的改革和对社会缺乏思考是对的。

即使右派没有运气立刻重新执政，也必须向它们说明上述情况，因为，当前的多数派将越来越需要挑起一种新的批评，这种新的批评能够使它们重新认识它们的逻辑推理，能够把辩论放到事实和结果上来，而不是让其仍旧停留在主观愿望上。

最后，也许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过去三十年中最主张变革的阶层，以及新一代的企业家和革新家：农民、经理和技术干部、中小企业主、天主教鼓动家。法国社会之所以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当然，更替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法国社会的继续发展不能缺少这些人，更不能与这些人对立。可是，如果右派不改变策略，他们在一场毫无成果的政治辩论中的政治术语就会愈益僵化。从长远看，对于法国社会来说，没有比法国的精英减少和倒退到保守主义而更严重的危险了。

获得胜利的左翼多数派，至少在现在，显得和处于一触即怒的反对派地位时一样僵硬。它比右派更不能接受会扰乱其良知和逻辑的劝告和推理。独揽一切或几乎一切权力的社会党，似乎受到了最高权力的引诱，醉心于谋求希腊式的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使希腊国王和人民陷入了灾难。左翼多数派真诚地相

信，5月10日和6月24日得到的委任状，使它负起了实质性的高级使命（如果不说是先验性的使命的话）。它把天使的商议逻辑同狂徒的决裂逻辑合二为一，做着救世主的美梦，妄图建立人间的天堂。似乎只要为阶级斗争进行报复的天主把商人赶出圣殿，获得安慰的公民就可以建设一个理想之国了。在同一个复杂的社会打交道，使之生存和演变、更加开放和不断发展的时候，有了这种推理方式，人们难道还能脚踏实地地干一番工作吗？

左派需要改革，特别要改革它的思考方式。这并不是让它出卖自己的灵魂，也不是要它接受经济上的约束。相反，它应该放弃道德上的斥责而尊重包括我们大家在内都带有缺陷的人，尊重他们所建立的机构。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这些机构组成了一个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左派不改变的话，我们就将面临一场新的宗教战争和新的停步不前。最灿烂美好的计划要是按这种推理方式来实施，那将一定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法国社会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现在上台的社会党新阶层的学习能力。民主更替的主要实效在于，这种更替能使一个富有经验、掌握另一种推理方法的新人打通和更新人们的思想。此外，这些经验和推理方式还不应该是过分陈旧的，换言之，不应该过分拘泥于一种过时的思想模式。

社会党的党员和干部是在国民教育的经院中培养出来的，不了解创业生活和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与危险性，他们热情、积极，甚至有些天真，从而有可能发现新的时机。但如果他们没有能力看到真正的现实，看不到人们的行为，既不服从天使的商议主张，也不按照简单化的阶级斗争逻辑，那么他们就会坐失良机。他们必须认识到计划经济演绎法不仅在专断政权的苏联，

而且在改良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国家都不存在了。

变革,即对人和决策的管理,只有建立在对资源、障碍和人力,以及人的学习能力和人的发展能力进行认真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成功。由于人们并不十分了解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当时的观念不是僵死不变的,他们准备变革,同时也能够等待。这种内在的关系,使密特朗先生在吉斯卡尔之后,得到了“恕罪后”的民主礼物。但是,不能把这种美德当成是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或仅仅走有计划的变革道路。它是准备变革,等待变革,但由于它产生得容易,消失得也就更快。

重要的不是同意变革,不是庄严的委任,而是要实施变革,而是要使整个社会都来学着进行可能的变革。然而,如果要学会的东西仍脱不出那个封闭的模式(因为倡导者不但过去确信这种模式有其独到之处,而且现在仍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任何学习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实际上,人们学会的仅仅是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来的为其所利用的东西。因此,人们要想使社会体系有一个更正确的模式时,不能抱着反对这个体系的态度来对其进行改革。没有本身就正确的模式,更没有天启的真理。在原来体系的基础上,在原体系上下功夫,而不是废除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变革体系的目的。

对右派和对左派进行劝说始终是必要的。在当前危险加剧、困难增多的形势下,这样去做尤为必要。眼前的当务之急是使法国摆脱由于分隔、缺乏交流和宗教战争必然带来的衰退过程中而出现的倒退。然而,这些劝说只有当他们有了超越两派的另一种思考,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同左派和右派进行严肃的交谈,就必须涉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问题,就必须找到意识形态斗争以外的话题,因为这场斗争使本来就打得难解难分的双方都采取一种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简单化的偏激态度,使双方更

加对立。

相反，社会党的胜利并没有使辩论变得更加实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听从于广告性论据的错误逻辑。当社会党政权的目标开始接触事实后，人们才能对法国社会作出新的预测性的分析，并提出新的选择的建议。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一方面应该考虑变革行动的必要性、局限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应该更深刻、更实际地认识当前法国社会的现实，以此为武器来谴责和提防左派和右派。

法国政治家之所以不能正确地思考问题，之所以保持着羞答答的保守主义，继续对至高无上的权力充满幻想，从而陷入无知状态，这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现实持有一种过于贫乏和狭隘的看法。必须让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论述这一现实，必须使辩论不局限于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的合理方案与服从于社会党总利益的各种利益相通的超级理想主义方案的对立。必须最终看到作为任何管理甚至任何集体行动基础的人类协商这一现实。制定法律不能依靠利益的逻辑，而必须依靠对一种思想方式给予现实的评价，因为人们是以这种思想方式感受组织、职业体系和整个社会的复杂性，即人们是以这种思想方式作弊，以这种思想方式应付上述复杂性，以这种思想方式回避复杂性，以这种思想方式改变复杂性。

“社会”对一切负责，社会造就出来的个人只是在维护自身福利的时候似乎才担负一定的责任。这种主张在前不久尚流行一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具有特别破坏力的主张现已不再时髦。然而，人们应该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社会结构与具体行为体系是在大量个人和集体自主行为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些结构和体系产生这些行为并引导这些行为，但是却没有控制行为的能力。靠法令之所以不能改变社会，是因为会碰到

巨大的、有组织的、多少有些强制性的错综复杂的自主运动，个人正是通过这些运动表示了他们的自由。

经过这番分析以后，人们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在三十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家们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变化。与经常流行的灾难性的形象截然相反，法国人比过去要自由、自信、自主和坚定得多；法国人对别人更加开放，交流的能力更大。他们比过去更加准备变革，更加容忍变革了。正是这种准备变革使变革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容忍变革使社会党人能够最终取得了胜利，并着手进行变革。

反之，我重申，准备变革和容忍变革并不意味着进行变革。前多数派对此尝到了苦头，因为它不善于利用它们为法国人提供实际发展的更好机会。它后来发现，它享受到的宽容已经结束了，这种准备变革的美德同样可以被它的敌人用来达到相反的目的。新的社会党多数派对此应有所警惕。它现在过于轻信法国已把变革社会的任务交给它了。

为了在各方面都取得进展，为了不至于错过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时机，归根结底，首先应该设法认真理解人际关系的最深刻的现实。这一现实既不体现在财政帐目、技术成果和选票上，当然也不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之中。

让我们来列举以下三个实例：分权化、企业管理和科研发展。它们构成了思考方式的三个应用题目。我试图通过本书论述这三个应用题目，社会党政府的行动把这三个题目放到了目前工作的中心。社会党的改革遵循依靠法令进行变革的模式。利益是存在的，得到人民委任的统治者将使之在地球上实现。当然，他们也考虑到各种阻力，知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但是，他们的改革并不从上述三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体系的现实出发。这种现实丝毫也不同于人们据以形成利益概念的那种极度